

## 中国儒教网

天地君親師

信息与公告	热点与专题	动态与关注	重点与推荐	重建与复兴	历史与圣贤	经典与教理	生命与体证	道场与礼制	国家与
风俗与日用	公益与慈善	判教与卫道	中国与世界	艺文与考据	学术与争鸣	儒门报刊	书目推荐	域外宗教	学者与

当前位置：首页 &gt; 学术与争鸣 &gt; 文章内容

## 【推荐】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说诠释

高寿仙 2010-8-21

“六经皆史”是清代著名思想家章学诚(1738-1801)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。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歧见迭呈，莫衷一是。笔者略述管窥之见，以就教于方家。

## 一、史之含义

“六经皆史”命题是由“六经”和“史”两个概念构成的，尤以“史”字为关键。然而，正是在这个问题上，出现了一些误解。在这些误解中，最为流行的一个，也许就是把“史”理解为史料。钱穆先生曾经指出：“(六经皆史)此四字中的这个‘史’字，我们近代学者如梁任公、胡适之，都看错了。……梁任公曾说：卖猪肉铺柜上的帐簿也可作史料，用来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或其他情况。”[1]可惜的是，梁、胡二氏的看法至今仍在流行。仓修良先生认为，“六经皆史”之“史”具有“史料”之史的含义，并补充说：

“史料本身就包含有史义，决不会有脱离史料的抽象史义。”[2]从一般的史学方法论的意义上说，过去所遗留的一切都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，都将被史学家作为史料运用，六经亦不例外。但是，这只是现代史学家的观念，绝不能归之于章学诚。张舜徽先生言：“举凡六籍所言，可资考古，无裨致用。六艺经传以千万数，其在今日，皆当以史料目之。”[3]特标出：“今日”二字，不以己意强加古人，比较客观。另外，视“史”为史料的学者往往拈出“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”一语作为佐证，实是对这句话有意或无意的“误读”，说见下文。

那么，这个“史”字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应以章氏自己的解释为依据。在《文史通义》一开篇，章氏即写道：“六经，皆史也。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。”(《易教上》)将这个论述化为逻辑推理，即是：政典是史，六经是政典，故六经是史。可见，弄清“史”之含义须了解何为“政典”。钱穆先生指出，“章实斋所谓六经皆史之‘史’字，近人只有王国维有篇文章叫《释史》，阐发甚是。王国维说史字篆文作‘𠄎’，上面‘𠄎’是一枝笔，下面‘𠄎’是一只手，一只手里拿着一枝笔，就是个书记”。钱氏还进一步论证说，章学诚“在《文史通义》里就特写了一篇文章名《史释》，正是解释这个史字。……他是说六经都是古代的‘官司掌故’，如我们说现在教育部、外交部多存有许多档案，有些是教育部、外交部的职官必须时时翻阅的，此等档案叫做‘史’，掌管这些档案的人也叫做‘史’”[4]。与钱氏意见相近者不乏其人，如吕思勉先生释为“凡先王之政典必为史官所记也”[5]，金静庵先生认为“古人于史官以外无著作，故掌于史官者，悉得称史”[6]，皆属此类。

然而，章学诚谓政典是史，意在强调“若夫六经，皆先王得位行道，经纬世宙之迹，而非托于空言”(《易教上》)，他注重的是政典的功用，而非“掌于史官”这一外在因素，故尔上述诸氏解释不确。钱氏将政典释为档案，尤欠周详。在《史释》篇中，章氏指出，“周官府史之史，与内史、外史、太史、小史、御史之史，……无异议也”，因为府史与其他五史“皆守掌故，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”。不过，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府史与五史没有区别；事实上，无论从地位上还是从职能上来看，二者都存在重大差异。以地位而论，二者有“官”与“吏”之别：

府史之史，庶人在官供书役者，今之所谓书吏是也；五史，则卿大夫为之，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，今之所谓内阁六科、翰林中书之属是也。官役之分，高下之隔，流别之判，如霄壤矣。

以职能而论，其本质差别在于“卿士大夫(五史)能论其道，而府史仅守其法”。

史守掌故而不知择，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。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，司会质岁之成，皆有调剂盈虚，均平秩序之义，非有道德贤能之选，不能任也，故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。若夫守库藏者，出纳不敢自专，庶人在官，足以供使而不乏矣。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，得其远大；若问库藏之纤悉，必曰府也。

五史以卿大夫之选，推论精微；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，而不敢自专。然而问掌故之委析，必曰史也。

这些论述没有受到足够重视，然而正是理解“六经皆史”命题的关键性文字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，章氏描述的周官旧制未必符合历史事实，吕思勉先生已对“其谓府史之史，亦即后世书吏，能存掌故之委析”深表怀疑[7]。不过对本文来说，此点无关宏旨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章氏的论点，而不是其论据。

从上引几段话中可以看出，章氏把作为职官的“史”区分为两层，与此相应，他把史官所掌典籍也划分为两类，若用章氏自己的理论术语来说，即撰述和记注。他曾指出，“三代以上，记注有成法，而撰述无定名”，也正因为“记注有成法，而后可以撰述无定名，以谓纤悉委备，有司具有成书，而吾特举其重且大者笔而著之，以示帝王经世之大略”（《书教上》）。在章氏看来，记注的目的在于“欲往事之不忘”，所以应该力求“纤悉委备”，而这一点只有依靠完备的制度才能做到。府史的作用就在于谨守固有之章程，保存帝王经世行道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文书档案，“而不敢自专”，即不能丝毫以己意损益之。当然，档案必须加以分类整理才便于保存和查阅，这种“整齐故事之业”亦须府史进行，章氏所谓“有司具有成书”之书，当即是府史整理的“比次之书”。然而，尽管“道”就在这些档案之中，但由于“史守掌故而不知择”，这些档案的意义和功能还无法发挥出来，尚须由五史“推论精微”，揭示出内含于其中的道。此即所谓“先王道法，非有二也，卿士大夫能论其道，而府史守其法”（《史释》）。这种道器合一的“典籍”，才是具有无穷功用的“政典”，才是章学诚心目中真正的“史”，“六经皆史”之“史”是指阐述先王之道的“撰述”。这一点章氏在《答客问上》中有明晰论述：

六经，皆史也。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孔子之作《春秋》也，盖曰：“我欲托之空言，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明著。”然则典章事实，作者之所不敢忽，盖将即器而明道耳。其书足以明道矣，笱豆之事，则有司存，君子不以是为琐琐也。

## 二、六经之地位

厘清了“史”之含义，对“六经皆史”命题存在的另一个严重误解就凸显出来。如果仅视“政典”为档案，则“政典是史，六经是政典，故六经是史”的逻辑推论就可变换为“档案是史，六经是档案，故六经是史”，这自然可以进一步推演出“史官所掌，属于史料之科，即章氏所谓记注”的结论[8]。仓修良先生亦谓：“章学诚再三说明，‘夫子述而不作’，‘夫子未尝著述’，《六经》只不过是删订而已。故《六经》是选辑，是掌故，是记注，而不是著述。”[9]这种说法不符合章氏本意，已如上述。金静庵先生似已意识到此点，故说“章氏所谓六经皆史者，不过档案之渐就整理者耳”[10]，强调了“整理”，惜仍视六经为记注，未达一间。

必须说明，将“六经是记注”的思想加之于章学诚并不是一个无关宏旨的误解，而是关涉到章氏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地位的大问题。侯外庐先生谓章氏“六经皆史”论“大胆地把中国封建社会所崇拜的六经教条，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”，仓修良先生同意此说，并谓“‘六经皆史’说的出现，说明了(正统与反正统)这两种思想斗争达到了高峰”[11]，恐皆出于上述误解。余英时先生亦极重视“六经皆史”之说，认为此说“是整个清代学术史上，继‘经学即理学’(顾炎武语)以后一项最大的突破”，意义主要有如下几项：一、首先要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。二、六经中所可见者，只是三代官师未分那一阶段中道的进程，三代以后的道，则不可能向六经中去寻找。三、六经已不足以尽道，而经学家从事考证训诂不足以通经，则其去道之远，可以想见。四、六经既不足以尽道，遂进而有“文史不在道外”之说。五、六经既只是古史，则最多只能透露一些道在古代发展的消息。至于“事变之出于后者，六经不能言”，三代以下之道，便只有求之于三代以后之历史了[12]。余氏条分缕析，心细如发，然笔者对其结论不能无惑。纵观《文史通义》，章氏不仅没有贬低《六经》之意，反而通过系统化论述强调了《六经》的崇高地位。

章氏认为，史之功用在于体现、弘扬“道”，因而特著《原道》对“道”加以界定和阐述。他写道：

道之大原出于天。天固谆谆然命之乎？曰：天地之前，则吾不得而知也。天地生人，斯有道矣，而未形也。三人居室，而道形矣，犹未著也。人有什伍而至百千，一室所不能容，部别班分，而道著矣。仁义忠孝之名，刑政礼乐之制，皆不得已而后起者也。

这段话是否说明章氏具备了“进化论的历史观”姑置不论，但他主张“圣人创制，一似暑葛寒裘”，“而非有所容心”，则论思甚精，与王夫之有不谋而合之处。但是，他又认为，道的显现和对道的认识到了一定时代就必然达到完备状态，在他看来，这个时代就是周公的时代：

自有天地，而至唐虞夏商，迹既多，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。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，而适当积古流传，道法大备之时，是以经纶制作，集千古之大成。（《原道上》）

这固然也是“时会使然，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”，但毕竟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，故曰：“创制显庸之圣，千古所同也；集大成者，周公所独也”（同上）。

“周公既集群圣之成，则周公之外，更无所谓学也”（同上）。孔子之圣，并非逊于周公，但他“生不得位，不能创制立法，以前民用”（《易教上》），故“表章六籍，存周公之旧典”以“明教于万世”（《原道中》），故亦可以一言而尽孔子，“曰学周公而已矣”（《原道上》）。前已指出，章氏心目中的“史”乃是据档案著成的体现“帝王经世之大略”的“撰述”，而《六经》乃孔子深知“空言不可以教人”，取以“明先王之道”之书，故可以说“古人不著书，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，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”（《易教上》），故可以说“若夫六经，皆先王得位行道，经纬世宙之迹，而非托于空言”（同上），故可以说“六经皆器也”（《原道中》）。对于后代人来说，“不见先王，当据可守之器，而思不可见之道”（同上），只能诵读《六经》，因为“道体无所不该，六艺足以尽之”（《诗教上》）。

总而言之，《六经》产生于道法大备的周公时代，又经孔子有选择的强调，故对后人来说，其价值固已崇高至极，无以复加。章氏指斥“儒家者流，尊奉孔子，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，则亦不知孔子矣。孔子立人道之极，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”（《原道中》）。此足可见孔子与《六经》在章氏心中地位之高。在《文史通义》中，章氏论及诸经的文字很多，每加颂扬。如评《春秋》曰：“史之大原，本乎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之义，昭乎笔削。笔削之义，不仅事具始末，文成规矩已也。以夫子义则窃取之旨观之，固将纲纪天人，推明大道”（《答客问上》）。如果认为，在章氏心目中，《六经》是“记注”之书，或者认为，章氏要“打破六经载道的见解”，“大胆地把《六经》从神圣的宝座拉下来”，这与章氏自己的议论不是大相龃龉吗？

### 三、“六经皆史”说之渊源

“六经皆史”说并非章学诚所首创。长期以来，学术界已关注到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过类似说法的许多学者，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，明王守仁、王世贞、胡应麟、李贽，清顾炎武、袁枚。王通《中说·王道篇》：

圣人述史三焉。其述书也，帝王之制备，故索焉而皆获；其述诗也，兴衰之由显，故究焉而皆得；其述春秋也，邪正之迹明，故考焉而皆当。

王守仁《传习录》卷上：

以事言谓之史，以道言谓之经、事即道，道即事，春秋亦经，五经亦史。易是包羲氏之史，书是尧舜以下史，礼、乐是三代史，其事同，其道同；安有所谓异。

王世贞《艺苑卮言》：

天地间无非史而已。六经，史之言理者也；编年、本纪、志、表、书、世家、列传，史之正文也；叙、记、碑、碣、铭、述，史之变文也；训、诰、命、册、诏、令、教、礼、上书、封事、疏、表、启、笺、弹事、奏记、檄、露布、移、驳、谕、尺度，史之用也；论、辨、说、解、难、议，史之实也；颂、赞、铭、箴、哀、祭，史之华也。

胡应麟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二：

夏商以前，经即史也，尚书、春秋是已。至汉而人不任经矣，于是乎作史继之。魏晋其业浸微，而其书浸盛，史遂析而别为经。

李贽《焚书·经史相为表里篇》：

春秋一经，春秋一时之史也；诗经、书经，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；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，史之所从来，为道屡迁，变易非常，不可以一定执也。故谓六经皆史可也。

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三：

孟子曰：其文则史，不独春秋也，六经皆然。

袁枚《随园文集》卷十：

古有史而无经。尚书、春秋，今之经，昔之史也；诗、易者，先王所存之言；礼、乐者，先王所存之法。其策皆史官掌之。

揆诸以上各家，论述角度不同，立言之旨各殊，与章氏议论之清晰、义蕴之丰厚相较，差异甚明，然与章氏之说亦有相合之点。王通提及三史，认为一备帝王之制，一明邪正之迹，一显兴衰之由，如此分断自是不当，然将三者渗合，固可得出史为政典与史有明道之用两点，章氏在《方志立三书议》一文中曾援引此言。王守仁之言，喻博文先生认为“比章学诚的话讲得还要清楚明白一些”，诚有未当，仓修良先生已予以批评[13]，但章氏所揭器道合一、即器明道之旨，实与王氏之论相合。王世贞区分诸籍，殊无条理，与

“六经皆史”似无思想上之渊源，然章氏所谓“盈天地间皆史也”则与其“天地间无非史而已”语极相近。胡应麟之论简略不明，然直揭出“经即史也”一语。李贽之论显受王守仁之影响，然主旨在于说明“为道屡迁，变易非常”，且在《焚书》卷三《童心说》中谓《六经》“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，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”，与章氏之看法判若冰炭，但“六经皆史”之提法实自此始。顾炎武之言在于论证《六经》乃经世之书，章氏之看法与之合。袁枚与章氏同时稍前，所言与章氏有相似处，故“论者或疑章氏识大之言，容有窃取于袁”，钱钟书、张舜徽亦谓袁氏之言即章氏所揭“六经皆史”之论[14]，其实二者并不全同，袁氏的看法接近于章氏所说的府史掌管的“掌故”，而章氏的思考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。

必须指出，上面的分析只能说是纯语词性的，除非有确凿证据，我们不能武断地判定章氏受到或未受到哪位先人的影响。钱穆先生指出，章学诚“不站在史学立场来讲史学，而是站在整个学术史立场来讲史学”[15]，洵为高论。我们探寻“六经皆史”说之渊源，亦应立足于学术史或思想史的广阔基础之上。前已指出，“六经皆史”说的要义在于视六经为政典，在于“古无私门之著述”（《方志立三书议》），钱穆先生谓其源出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之“诸子皆出于王官之学”论[16]，不为无据。需要说明的一点是，此说乃刘向、刘歆所创，章氏对他们极推崇，而对班固则颇有不满，认为“自班固删辑略，而刘氏之绪论不传（自注：辑略乃意群书之旨。）”（《和州志艺文书序例》）。不过，依笔者浅见，此说尚有更远的源头，当溯至《庄子》。钱钟书先生已注意到了此说与道家的关系，指出：

《庄子·天运篇》记老子曰：“夫六经，先王之陈迹也，岂其所以迹哉”；《天道》篇记，桓公读圣人之书，轮扁谓书乃古人糟粕，道之精微，不可得传。《三国志·荀彧传》注引何劭为《荀彧传》，记彧谓：“孔子言性与天道，不可得闻，六籍虽存，固圣人之糠粃”云云。是则以六经为存迹之书，乃道家之常言，六经皆史之旨，实肇端于此。[17]

笔者以为，钱氏所引“先王之陈迹”、“古人糟粕”云云，乃道家贬斥儒家之言，稍失之正。更可注意者，是《庄子·天下》篇中的这段议论：

古之人其备乎？配神明，醇天地，育万物，和天下，泽及百姓。明于本数，系于未度，六通四辟，小大精粗，其运无乎不在。其明而在数度者，旧法世传之史，尚多有之。其在诗、书、礼、乐者，邹鲁之士，绅先生多能明之。……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，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。天下大乱，圣贤不明，道德不一，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。……悲夫，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。后世之学者，不幸不见天地之纯，古人之大体，道术将为天下裂。

章学诚缕述先秦学术之流变，实以此段议论为依归，如谓“诸子百家，不衷大道，其所以持之有故，而言之成理者，则以本原所出，皆不外于周官之典守，其支离而不合道者，师失官守，末流之学，各以私意恣其说尔，非于先王之道，全无所得，而自树一家之学也”（《易教下》），其沿袭之迹甚明。在《原道下》中，章氏指斥了后儒分别门户——如陆学与朱学之弊，且以“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，必不合矣，悲夫”作结语，可见《天下》篇之言必深契其心。

最后，顺便解释一下前面提及的一个小问题。章学诚在《报孙渊如书》中说：“愚之所见，以为盈天地间，凡涉著作之林，皆是史学，六经持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，于集诸家，其源皆出于史。”许多学者以此证明章氏所言之“史”即史料，实误。细绎章氏之言，实是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立论。在他看来，古无私门著述，皆为政典，为王官之学，故皆是史，子集诸家，皆出于王官之学，皆为史之流裔，故亦可视为史。必欲解此“史学”为史料，则对“整辑排比，谓之史纂，参互搜讨，谓之史考，皆非史学”（《浙东学术》）又作何解释？笔者由此想到，《文史通义》是一部内容极为丰富的“论文集”，所论问题很多，撰写时间不一，显得有些缺乏系统性和逻辑严密性。在把握书中的概念时，必须注意其论述的主题的层面和语境。比如使用最多的“史”字，其内涵和外延在全书中绝非统一的、固定不变的。若想真实地了解其含义，只能将其放到特定的范围，比如学术思想史、史学发生论、史学本体论、史学认识论、历史编纂学中去把握。本文的诠释仅限于“六经皆史”之“史”，并非章氏在各种场合所使用的“史”字的全部含义。

[1] 钱穆：《中国史学名著》，星星出版社，第315页。

[2] 仓修良：《章学诚与〈文史通义〉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，第114—117页。

[3] 张舜徽：《史学三书平议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，第179—180页。

[4] 钱穆：《中国史学名著》，星星出版社，第315—316页。